

书画收藏这件事

■王永林

《书画记》一书为清初徽州人吴其贞所撰之读画笔记,其读画、鉴画、藏画及交游,皆详录之,卷二所载一则,颇为有趣:“关全晴冬寒林图绢画一幅。画寒林峭壁,有险绝之势。画法苍秀,盖作小劈斧皴,为全之妙画。以上二图(另一图为米元晖云山图纸画一卷)向在溪南,近为李周生得之。约余往观,忽骤雨倾盆,山水陡长,到梅林桥时桥已漂去,势如山崩。余急买舟渡去,至返渡时,雨霏水消,复有畏渡之心。舆夫曰:‘去时水高一丈,不以为畏,今来时水消有半,何复畏耶?’余曰:‘然矣,去时心在画而忘于水,来时心在水而忘于画,故不畏前而畏后也。’时辛巳四月二十七日。”吴其贞痴于书画鉴藏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曾有人说:收藏这件事,说好听一点,是一种爱、是善、是文化、是理性、是智慧、是人类高雅进步的生命行为;然而,说收藏是欲、是瘾、是病、是怀旧者的梦、是傻子的游戏,也没有什么不对。

周作人则说: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,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,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,看秋河,看花,听雨,闻香,喝不求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,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,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”此言虽未说书画,我觉得其意相同。如此这般来说收藏,虽谈不上“高、大、上”,但还是颇为贴切的。

于我而言,读书、喝茶、饮酒、游历、访友是轻松惬意的闲适之事,作文述事是有感而发、不吐不快,而书画鉴藏则是一份精神必须高度集中,聚精会神才能完成的工作,否则痛苦便会随之而来。所以,书画鉴藏始终是一件“痛并快乐着”的事情,因为平生最快乐之事可以由此而生,平生最痛恶之事也可能由此而来,且还会牵扯到极多的人与事,故其是爱、恨间之事耳。

至于书画是什么?我们为什么要收藏书画?我借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,来表达我的认识。沈先生的这段话,虽也不是专门在谈书画,但其文字所表达出的意思,却是可以用来谈书画与书画收藏的,因为先生之所谈与我之设问,皆是言中华之文脉。当然,用这段话来回答这两个问题,并不全面,因为,只注重了精神性,而忽略了财富性,但书画的财富性是由精神性决定的,故这一回答,我认为还是完满的,富有哲理的:

“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,或一时功名赫赫,或身边财富万千,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……但是,一通过时间,什么也不留下,过去了。……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,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,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。因之历史如相连续,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,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。”

书画之鉴藏,古已有之,只是今日更为繁盛,更为普及,更为热闹。论鉴与藏,古、今并无多大差别;而论其功能与手段,则古与今已有了很大的不同;再有,就是参与的人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古人参与书画鉴藏者,文人士大夫、皇室官宦为主要力量,偶尔也有富裕的儒商巨贾参与其中,总体来说是小众行为,精英的游戏;功能则以“成教化、助人伦”、怡情悦性为主要目的,以对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欣赏、理解来体现个人的品味,是花钱买雅兴;财富的功能,礼品的功能,则为辅。而今天,参与书画收藏的人,是上至官、下至民,文人商贾与贩夫走卒,有知与无知,巨富与温饱皆跻身于其中,收藏已成为文化精英、财富精英与普罗大众共同的“事业”;且都以财富的功能为主旨,使其成为投资品,有些已类于现代金融产品了,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,重点着眼于投资回报率与风险的管控,大多是希望借此发财致富;同时礼品的功能也被更加突显了出来,成为官商交易的一个重要工具,号称“雅



五代

关全

秋山晚翠图

绢本

贿”;反而怡情悦性的功能,对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欣赏与理解,变成了附庸风雅而已,“成教化、助人伦”之功能几被忘却矣。交易的手段,也从小众间友朋私下相互交洽,变成为公共市场性的行为。因此,鉴藏与投资共同行为中的“鉴”,在当今变为十分敏感、非常有热度的话题,因为真、伪有时会关系到收藏、投资者财富的有、无。

在收藏圈中经常会听人说:“真东西自己会说话。”其实,假东西自己也会说话。但最为关键的却在于,不是它们会说话,而是你是否能听得懂它们说的话。这就要求你必须先学懂这些语言,比如真东西说的是标准语言,假东西说的是各地方言,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语言天赋,并勤奋地学会这些语言,而且不断地深入到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群中去实践应用,使自己与他们(它们)交流无碍。到这时候,你才有资格告诉别人说:“真东西自己是会说话的。”因为你听到了,也听懂了。而没有掌握这些语言的人,则仍然是听不懂的,和没听到是一样的。

再有,只学会了标准语言的人,却未必能听懂方言,何况还是各地方言。所以,只懂标准语言的人,即使你是标准语言方面的专家,也千万不要去乱猜各地方言,否则会笑话百出,害人害己。有时听画家们谈中国书画的“笔墨”也是一样,明了工细规整画笔墨的人,未必能理解得透写意画的笔墨,反之亦然;非要强作解人,则多失之偏颇。故,从事书画鉴赏的人,视野宽博,不以自己的好恶为鉴赏标准,就显得非常重要,否则就会错“杀”无辜,真假颠倒,美丑错位,更不要说体悟画者之“笔墨修养”了。所以,真正的书画鉴赏家,最大的本领是能识别不同书画风格的至高境界。这既需要明了书画境界的高低,也需要包容书画风格的多样。这也就解释了书画鉴定家,虽以自身具备书画功底为最好,但一般的书画家却未必能够胜任鉴定书画工作这样一个规律。术业有专攻也。

关于鉴赏之道,王季迁先生在《题画杂录》中有段话说得好:“鉴画须劣画中辨其真,佳画中识其伪,始为能事。今以评断严格,稍不惬意,即以伪品目之,犹非真鉴赏之道。”然,真鉴赏之道,何其难哉!金钱资本与见识、修养、天赋,乃至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一个也不能少,缺一难成事也。

鬼狐有性格 笑骂成文章

■郑学富

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的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,是中国古典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。该手稿是用竹纸抄写,共收237篇,其中除《库官》《酆都御史》《龙无目》《双灯》等31篇是他人代抄,其余的206篇均为蒲松龄手抄。尤其珍贵的是在卷前《聊斋自志》文后钤有一枚“松龄”白文长方印,这是蒲氏手稿不可多得的佐证。书中眉栏上及各篇正文间有蒲氏手录王士禛评语及佚名校语。手稿本《聊斋志异》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物和学术价值,为研究《聊斋志异》的成书年代、分卷编次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证据,是校补现行《聊斋志异》诸多版本文字舛误的第一手资料。

蒲松龄,字留仙,一字剑臣,别号柳泉,亦称柳泉居士,为清初淄川人。他早年热衷科举入仕,可屡试不第,只能以教书为生。康熙元年(1662),蒲松龄22岁时开始撰写狐鬼故事,他自谓“喜人谈鬼”“雅爱搜神”。据清人笔记《三借庐笔谈》记载:蒲松龄每晨起就在大道边铺席于地,并摆设烟茶,坐待过往行人,以搜集奇闻异事。每听到一事,回家后就加以粉饰润色。康熙十八年(1679)春,40岁的蒲松龄初次将手稿集结成书,名为《聊斋志异》。此后屡有增补。清初文学家王渔洋在朋友处结识蒲松龄后,对其十分赏识,以为奇才。王渔洋借阅《聊斋志异》后,欲以500两黄金购买手稿,但被蒲松龄婉拒,于是在书卷后题诗评价曰:“姑妄言之姑听之,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应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诗。”蒲松龄则作《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》答谢:“志异成书共笑之,布袍萧索鬓如丝。十年颇得黄州意,冷雨寒灯夜话时。”述说了创作之艰,也表达对王渔洋给予的肯定和赞许的感激之情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),蒲松龄去世半个世纪,《聊斋志异》方刊刻行世,从此广为流传。《聊斋志异》收录短篇小说近500篇,或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,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,或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,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。作品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,人物形象鲜明生动,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,结构布局严谨巧妙,文笔简练,描写细腻,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。郭沫若曾题联赞道: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,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。现代文学家老舍评价说:“鬼狐有性格,笑骂成文章。”

蒲松龄在去世前为家族立下规矩:“长支传书,次支传画。”按此遗训,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由其长子蒲箬一支世代传存。清咸丰年间,蒲松龄八世族孙蒲价人为躲避战乱,携手稿闯关东,定居沈阳,后将手稿传给儿子蒲英灏。光绪二十年(1894)蒲英灏供职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,依氏借阅《聊斋志异》稿本,蒲英灏先以半部借之,阅毕后再借另半部。后因变故下半部手稿下落不明。蒲英灏去世后下半部手稿传第五子蒲文珊。蒲文珊对《聊斋手稿》的珍视胜过其父。这期间有多人相借、预购,包括日本人出高价收买均遭到蒲文珊的拒绝。1950年蒲文珊将手稿捐赠辽宁省文化处,1951年转交东北文化部。由于这部手稿纸质变色、发脆,不宜保存,请当时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周福成老师傅重新装裱,宣纸加衬,作成金镶玉装,使这部书由原来的四册改成现在的八册,并转交东北图书馆即辽宁省图书馆收藏。《聊斋志异》手稿为国家级文物,也成为该馆藏书中的镇馆之宝。2019年,辽宁省图书馆携手沈阳出版社首次对《聊斋志异》手稿进行高清原件扫描,采用彩色仿真影印,宣纸内页印刷、线装,蓝布函套,开本与手稿本原件一致,极大还原了手稿质感。让读者跨越时空,一睹蒲松龄真迹。



《聊斋志异》手稿